

# 节俭，互动之后亮出监督

文/本报深度记者 任鹏

1 “这是多正常的事，也要拿出来宣传？”

在庞胡瑞的观察中，一股“简朴风”正由上而下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中刮过。

作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人民网舆情频道执行主编，庞胡瑞发现，自从中央发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后，新政风、新作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一致的动作。

星级酒店面临的政府宴请退订潮让酒店经营方忧心忡忡。甚至在结束不久的各省、市两会中，几乎普遍出现的不摆鲜花、不铺红地毯、节俭办会，都被看作是新政新风的一部分。

“讲得刻薄一点，目前看起来各地贯彻得不错，但前面还得加上：看起来。”

庞胡瑞提到了前几天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一位政协委员在开会时自己倒水。也许这个新闻的本意是想说明两会和代表委员们的改变，但他注意到，社会公众对此并不买账，评价非常犀利。

“不用服务员，自己倒个水，这是多正常的事？这也要拿出来宣传，是要掌声是要夸吗？”网友的批评毫不留情。

庞胡瑞分析认为，目前对于各地普遍存在的新政新风的宣传与舆论，有过度解读的趋向。

在他看来，官员本来就应该节约，避免浪费，本来就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大吃大喝，本来就应该改变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公务人员，这些都是本应该做到的事，现在反而因为做到了而成为新闻。

“这一段时间，部分媒体，对政府和官员们的新政新风表述得过多，把本该做的正常行为夸大了。”庞胡瑞说，“这只能说，在以前那种官场文化、官僚作风的影响下，一部分社会情绪逐渐失去了正常思维的方式。”

庞胡瑞表示，很多人并不认为这种改变应该被鼓励，恰恰相反，现在只是补了原来的欠债而已。如果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变化，很容易让社会公众产生一种不信任。

“我们更希望能够深入到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提高官员清廉指数这些最深层次的变化上，从更实质的层面去赢得民众的信任。”庞胡瑞表示，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一方面让官员的行为方式回到正常轨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会情绪回到理性思维，不要把公务人员和权力的拥有者推到比较高的位置。

“从现在起，应该亮出监督的目光，把公务人员还原成一个正常人。”庞胡瑞说，“更加严厉地去监



▲1月22日，四川省两会，政协委员们的自助晚餐。

诗人海子生前曾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海子去世14年后，在这个温饱已被基本解决的时代，关于粮食和蔬菜的话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场最先由官方提出的“厉行节约、杜绝公款浪费”的表态与行动，得到了民间充分的反应和对接。但在这场遍及全国的节俭大行动中，一片叫好的声音里，唯独不能缺少冷静的看待与理性的分析。

在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庞胡瑞看来，现在对官方和官员的节俭表现，有一种过度解读的趋势。比不摆鲜花、不铺红地毯、减少公款消费更需要的，是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提高官员清廉指数这些最深层次、更实质的改变。

督公务人员的行政作风，让他们觉得只要犯了错，就会有一双眼睛去盯着。这才是一个规定和禁令最终的目的。”

2 官方的行动，得到了民间响应

1月31日，济南的王谦和女友去泉城路一家酒店就餐时发现，餐桌上，同样摆放着“爱惜粮食，拒绝浪费”的提示牌。

在他的印象里，这两周来，他去过的多家餐厅都在倡导旨在节约的“净桌行动”、“光盘行动”，为顾客提供“半份菜”、“小份菜”、“热菜拼盘”以及免费打包等服务。

其实，王谦所说的这个“光盘行动”，早在1月上旬就开始了。发起于北京的这场公益活动号召市民在饭店吃光盘子里的食物，剩饭打包，形成人人节约的好风气。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舆情观察中，这是一种好现象。庞胡瑞表示，这是官方做出厉行节约、杜绝公款浪费的表态与行动之后，民间的一种顺势反应。

“在中央的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之后，民间自己发起了以‘光盘行动’为代表的倡导节约、反对浪费的行动，是对官方行为的一种对接。”

庞胡瑞告诉本报记者，“光盘行动”能够被如此广泛传播，是因为节俭呼应了公众内心对这种传统价值的认知。另一方面，民间的这种对接，与中央近期严打贪污腐败，杜绝党内不良作风以及倡导节约的新政思想有一个契合点。民间对官场的公款吃喝深恶痛绝，在这样的社会情绪下，官方的新政，恰恰能够与民

间的要求形成呼应与共鸣。

当民间行为与官方对接之后，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这一批示在各个省份、各部门引起强烈反响。社会情绪与氛围再一次被放大。

“这种变化最大的价值在于民间对接官方，以及此后两个层面的相互呼应。”庞胡瑞表示，“从积极意义上看，民间的反应远大于官方的行动，远大于官员们不去酒店而是去吃食堂的行为，因为这种情绪是一个全民性质的，影响力更大。”

3 公权力的引领作用，与制度同样重要

几乎是动作一致，各地都在落实“八项规定”，目前已陆续有数个部委、大约30个省份相继出台了落实的实施细则、措施。甚至不乏有特点的细化条款。

比如，河南省要求干部公务用餐“一律不超4个品种菜，一律不上酒”。贵州省则规定，对外接待工作用餐不超过45分钟，河北省更是提出“各类专题会议不超过半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这些地方政府亮明态度、做出行动之后，下一步关键就是落实。他建议用细化的执行条款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同时引入舆论和社会监督，并出台问责机制。

制度和规则真的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吗？至少庞胡瑞对此并不完全乐观。

庞胡瑞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

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了上百个文件，还是管不住官员的大吃大喝。实际上，中国是最不缺制度和政治智慧的国家。但这么多的制度为何未能改变现实？

庞胡瑞的观点是，这些改变最核心、最本质的，恰恰在于要改变公权力的内在气质和精神状态。

“很多时候不只是制度在起作用，而是公权力本身的示范效应。”庞胡瑞说，“为什么这次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这么容易就能推下去，甚至很多官员主动去做？习总书记和中央领导们的示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带头去做，榜样的力量是能够看到的。”

在日常的舆情观察中，庞胡瑞特意提到了应对雾霾天气，全国多个城市停驶一定比例公交车的例子。

庞胡瑞说，“这次北京公布了875辆公务车违反停驶规定出行，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支持与赞扬。”

在他看来，公车停驶以及违规公车被曝光，前者是公权力的正面示范，后者则是约束公权力的警示效应。

庞胡瑞表示，不能忽略公权力负面形象所带来的伤害。像现在部分单位顶风而上、官员贪腐违纪这样的负面消息，对权力的公信力以及公众信心的伤害，是更多官方和官员的正面行为都弥补不了的。

“公权力在社会事物和社会进步中的主导、引领作用是关键，与制度和规定同样重要。”庞胡瑞说，“中央领导带头带着官员去做，官员带着小社会去做。小社会的环境好了，大社会也就完善了。如果官员能够率先做到，足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社会才能形成共识。”

(上接B01版)

张智勇：

刑辩律师的春天回来了

2012年3月份之后，被称作“刀尖舞者”的刑辩律师，身上背负的压力终于慢慢散去。

2013年1月31日，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重庆律师协会刑事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智勇，因为成为不雅视频女主角之一赵红霞的辩护律师，而变得异常忙碌。

“赵红霞的家人慕名而来，委托我们智豪刑事律师团队担任赵红霞案的辩护律师。”张智勇口中的“慕名”，指的是该所确立“专做刑事辩护”的方向以来，特别近几年来办理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诸多大案要案后慢慢树立起的口碑。

2009年初重庆掀起“打黑”风暴后，张智勇带领该所律师团队向“专做刑案”方向转变。在本地许多律师眼中，这是一个“不理智”的举动，在外地律师看来，刑辩律师风险大，在重庆做刑辩律师风险更大，而整个律师事务所全部做刑辩更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会见当事人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了，律

师和当事人的权利也都能得到保障了。”张智勇说，自2012年5月份以后，重庆的律师行业逐步回归正轨。

回忆起在打黑风暴中的环境，“会见难！”张智勇和该所其他几位律师脱口而出。“在会见当事人之前，我们连承办单位是谁都不知道。”智豪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石宗初说，当时专案组众多，自己接手案件后，根本无法确认其所属的专案组。“特别是涉黑的刑事案件，即使运气好，确认了承办单位，在开庭之前，我们得到准许会见的机会也很少。”

“阅卷难”——则是他们面对的第二道门槛。“本来案件被移送检察院以后，律师就可以进行阅卷，但在打黑期间的刑事案件，到了法院阶段我们才可以阅卷。”张智勇说。

“我们代理2009年陈明亮案的一个主犯时，案卷足有300册，每册又有200-300页。”张智勇告诉记者，案件被移送法院至开庭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的辩护团队只能连夜加班加点。

“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张智勇说，除了专案组在开庭前设置种种障碍、会见现场全程监听，庭审时有的专案组还会派员在场旁听。“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从检察院审查、起诉开始，公安部门就不应介入了。”该所另

一位副主任罗林律师说。

“当时有不少律师在面对这种监视时，如质疑刑讯逼供之类的话不敢说，即使说了，也是点到为止。”张智勇说，他在2009年代理重庆某区县的一起涉黑案件时，在法庭上当庭表示专案组存在刑讯逼供。庭审结束后，当地一位司法局局长专门找到他，在向他表示了敬佩之意后，小心提醒他：“你要保护好自己，要讲究方式方法。”

辩护的压力不止于此。张智勇说，在打黑期间，每听到律师被抓的消息，大家都觉得不是滋味。另一位律师还说，他曾在渝北区的某看守所会见一位当事人时，会见室门口的专案组成员说：“注意哦，李庄的例子很惨重哦。”

即便承受着如此压力，“在打黑期间，我们还是敢接涉黑案件。”张智勇说，他告诉自己的团队，就非法证据排除和刑讯逼供等是大非的问题上，在法庭上要 and 公诉人针锋相对，绝不能含糊。“不仅要说，还要大声说。正因如此，我们也成功揭了好几顶涉黑‘帽子’。很多外地律师认为，重庆律师在打黑时不敢说真话，这绝对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想法。”

因为代理涉黑嫌疑人的案件，他们还承受了一些市民“狗头军师”、“黑律师”的评价。

“2009年，我们的律师执业证封面由红色更换为咖啡色，业内的律师就开玩笑，以‘黑律师’互称。”想起那一幕，张智勇忍不住苦笑。

2012年3月份之后，被称作“刀尖舞者”的刑辩律师，身上背负的压力终于慢慢散去。

2012年3月15日，石宗初正走在会见完当事人回律所的路上。“听到广播里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脑海中第一个想法就是，春天回来了。”罗林补充说：“是刑辩律师的春天回来了！”

据张智勇及同事回忆，2012年4月中旬后，在代理案件过程中，会见、庭审时公安部门的陪同逐渐减少并最终取消。

张智勇说，2012年5月份，他在会见某专案嫌疑人时，遇到原重庆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现在当专职律师），“当时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想阻拦我们会见，我们当即据理力争：‘如果不让我们见当事人，我们就去市政法委投诉你。’最后那个工作人员还是服了软。”

“相对来说，重庆迈的步子还是挺大的。”张智勇说，“这也让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乐观了很多。”

(除张智勇、石宗初、罗林外，文中其他受访者皆为化名。)